

责任编辑：秦 静
封面设计：王志伟

中国社会民俗史丛书

医 俗 史

陈乐平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 经销 吴县文艺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875 插页 10 字数 145,000

1997 年 11 月第 1 版 199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 7-5321-1670-0/K·107 定价：13.40 元

文芳齋主
此幅畫作，筆墨流動，人物神態活潑，色彩鮮明，具有濃厚的生活氣氛。畫面中，一位頭戴官帽、身着官服的士人，正從書架上取下一卷書卷，似乎在尋找某段文字。他的身邊，一位侍女正拿着一把大扇子，為他搧風解暑。背景中，還有幾件家具，如案几、椅子等。整幅畫作，既表現了官員的日常生活，也展示了當時社會的一個側面。





图二 选自《点石斋画报》中集

图三 选自《点石斋画报》

丑集



名醫偶誤

醫家言產科一門
並無精究而胎前較產後為更難良由
母氣不同故胎氣
眞且有脣子錢似之圓無從以手取者
真滿莫辨即攻
稍而難治或不慎誤即隨之害醫甚大
復以婦科名家某
日黎明時家僮啓戶見婢兒鑲鈎上挂
有女孩臂青精理
產科字樣手燃藥方一紙僅附而未著
其妻出視其女知
係其家物急令藏過
袖百金
往僕某處詢聲張
乍當
時已被鄰人竊去
鉛山九
種曲有口瘡胎認做是傳
經皮裏雙
疾於挺之語亦堪特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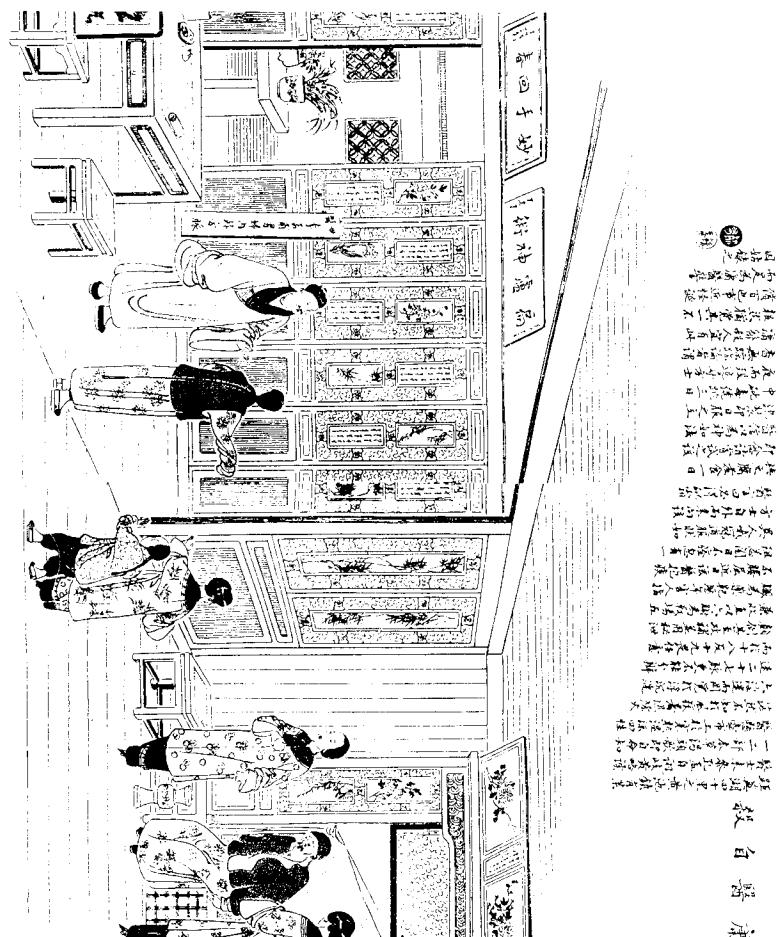


图四 选自《石斋画报》
庚集

图五 选自《点石斋画报》

子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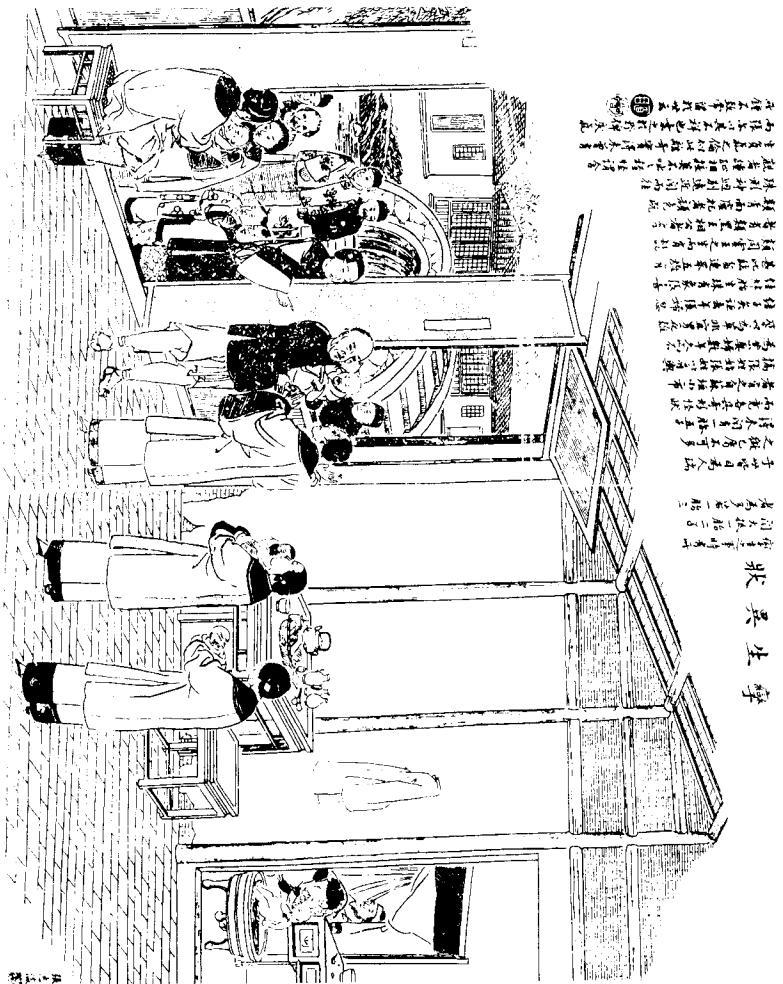


图六 选自《点石斋画报》

土集

图七 选自《点石斋画报》亥集





图八 选自《点石斋画报》

集

前　　言

长期以来,中医作为一种方技,往往被一些人视作为“雕虫小技”或“屠龙之术”,在学术理论界总是难入大雅之堂。对此,1991年我出版了一本经过多年研究而成的学术专著《出入命门——中国医学文化学导论》。我以为,从“文王演《周易》”,“则乾坤之阴阳”(阴、阳),“孔子述《春秋》”,“效《洪范》之咎征”(五行),到“董仲舒治《公羊春秋》”,融阴阳五行成一体,“为儒者宗”(以上均见《汉书·五行志》),在儒或儒道互补所显示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构建和发展中,着实蕴含了中医学的繁衍基因。并得出“正是儒、道、医三者的文化合流,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构架”。这样一个从中医学这一生命文化的胚基出发,进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建构过程进行探索后得出结论。

以上的观点和结论得到了许多同行们的赞同,特别使我感动的是,在学术理论界享有盛誉的胡道静老先生对我的研究成果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认为我的关于“中医学这一生命文化的胚胎,是中国整个传统文化和社会历史推进的舵桨,是中国传统文化区别于世界文化的分水岭”^①,同时异常感慨地

^① 见拙著《出入命门——中国医学文化学导论》,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序一。

指出：“为什么在人类对大自然的探索中，明确地提出首先着重的是要立足于对自身生命的探求和解决一切问题来得那么姗姗其迟呢？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恰恰就是在这一点。”^①

在那本著作中，我较为系统地阐述了为什么说中国医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构架的理论。后来经过进一步整理，我又以文章的形式发表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6年第3期上，文章的题目为“儒道医，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构架——对中医学在中国传统文化建构中的作用和地位的哲学思考”。这一理论简而概之，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如果我们从发生学意义上去追寻，那种认为原始人类对宇宙现象的观察和思考是原始初民认识世界的基点，这是无可非议的，但是人对这种自身生命体以外的世界的冥思玄想，毕竟没有对于自身内在生命体的实实在在的体验真切，如远古人类对生殖器的崇拜就是典型的例证。因此，可以说对人的自身生命的体悟，无疑成了原始人类认识整个世界的又一条重要思想途径及又一个认识基点。以上两种体验和认识又是相互影响、渗透和相互验证的，如中国神话传说中人类文明的始祖伏羲就是“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中观万物于人及鸟兽之文与地谊。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而易理始起，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②因此，人类的文明只有建构在对自身的认识，即对生命体和生命现象的大彻大悟上才能得到合乎人性和合乎科学的发展，而医学正是担当起了这一伟大的历史重任。

① 见拙著《出入命门——中国医学文化学导论》，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序一。

② 见清代《古今医史》。

我们知道医学是生命科学的前沿，她同时也是生命文化的基石，医学（包括原始医术）的历史不仅是人类不断认识自我（生物人）的历史，同时也展示了人类文明进步的每一个历程。因此，医学对人的生命的认解，以及给人类认识史上带来的革命无疑是极其显著的。如果我们对古希腊希波克拉第代表的医学、古印度的佛教医学以及古代中国的中医学进行一番深入的考察，都会得出以上的结论。可以这样说，在古代中国秦汉以前，中国传统体系的构建成熟过程中，中医学着实起到了与儒道合流鼎足并举的作用。

第二，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之一是“天人”观。

我认为，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家的“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宇宙图式，是与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如老庄、《周易》的重在天地之大法，自然科学领域的《黄帝内经》的重在生命之枢要，以及“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社会历史观相一致的。它们都在寻求自然与人的内在规律，并构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自然的人化”（马克思语）的文化体系。但同时，作为这一文化体系的基础构架的儒、道、医三家，在对待“天人合一”的沟通方式上却存在着显著的差别。

首先，我们来看“天人合一”中的“天”。虽然道家讲天道，儒家说天命，医家言“天气”（人禀天地之气而生），三家说法各异，但相同之处都是指人以外的客观自然“天”。

三家对“天人”关系或“自然与人”关系的根本区别，是在如何对待“人”这一方。道家讲修心，重在对人的生命形态（自然人）的观照；儒家讲修身，重在对人事系统（社会人）的关注；医家则是将以上两家融会贯通的学说。

道家的宗旨是“贵生、度人”，因此道家修炼的终极目标是

“得道成仙”、“长生不死”，与自然化合为一；儒家的宗旨是重人伦，崇尚“礼乐”和“仁义”，其训诫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体现的是一种“天不变，道（人伦之道）亦不变”的终极价值观。

医家认为，首先，人体作为自然界的一个成员，和自然界有着某种特殊的联系，如章潢《图书编》中说：“呼吸与天地相通，气脉与寒暑昼夜相运旋，所以谓人身小天地。”并创立了中医学上的“人身为一小天地”之说。中医学还认为人还能积极主动地对自然进行调摄适应，即改造。这就是存在于人的生命体中的内外感应系统，或称生命调节机制。当然，中医学上的所谓改造自然，其主要是体现在协调人的生命有机系统上，它虽然与道家的宗旨有相同之处，但实在比道家的“玄思”来得更科学和辩证。这便是中医学从人的自然性角度对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所作的贡献之一。

人又是一个社会的人，同时更是自然和社会的统一体，这种统一体在“天人合一”的意义上便是自然性与社会性的贯通。如《黄帝内经》中的“心主神明论”就是中医学以一个古代小朝廷的模式对人体心身活动的一种假说，它认为心为君主，一切心身现象是由心统率的。《黄帝内经·素问·灵兰秘典》还描述了这个“朝廷”：心以下由肺、肝、胆、膻中、脾胃、大肠、小肠、肾、三焦、膀胱组成，它们分别为相傅、将军、中正、臣使、仓库、传导、受盛、作强、决渎、州都等官组成。实践证明，这个设想不仅有趣而且有临床的实证意义，中医学凭着这种心主神明论来认识生命，取得了治病疗疾的实际效果。

反观内照，中医学的这种将“社会人”向“自然人”的比附，为我们从“自然人”向“社会人”的认解，即从生命现象来认识

社会现象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思考途径，同时也对我们认识中国古代早已有之的生命文化现象有所启迪。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医学中所言的“天人”关系，既不同于道家的“天人（自然人）”关系，又有别于儒家的“天人（社会人）”关系，它是将天和人的自然性、社会性两者三方共熔一炉的一种关系式的认解，它在中国传统文化以及社会历史的延续上起到了一种不可忽视的催化作用。

第三，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之二是“阴阳”观。学术界一般认为，阴阳观念作为中国古人哲学思辨的结晶，主要体现在《周易》和《老子》中，如《周易》中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系辞》上），《老子》中说“万物负阴而抱阳”。

但是，我以为中国古代阴阳哲理最完整准确的体现，则是在医家之经典的《黄帝内经》所表述的中医理论体系中。

首先，《黄帝内经》的成书年代与《周易》、《老子》相仿，书中道阴阳之言辞的出现频率，比之后两书又高得多。说中医学中的阴阳观受到《周易》和《老子》的影响是可信的，但那种把中医学中阴阳之说的哲学来源说成是来自《周易》和《老子》的观点则是本人不敢苟同的。别的不说，就是从文化发生学上说，医与道、医与《周易》也是同源的。^①

再者，《黄帝内经》也是一部言人身（生命的再生产或生命的物质构成体）的典籍，如果说阴阳之说源于“性器”说的观点还难以推翻的话，那么中医学的阴阳观不说有理由早于《周易》或《老子》的阴阳观，最起码三者也是同出一源、并行不悖、

^① 详见拙著《出入命门——中国医学文化学导论》，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六章。

又相互影响和观照的。^①

最后,《黄帝内经》又是一部求人生(生命的长寿久安)的典籍,这里就关系到如何完整、准确地理解阴阳之道了,否则就难以使生命呈现出蓬勃的生机,而中医学中的阴阳之道与《周易》、《老子》中的阴阳之道存在着显著的差别。

《周易》中的阴阳之道存在着扶阳抑阴的倾向,如《周易·系辞传》中说:“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老子》中的阴阳观是扶阴抑阳,如《老子》中说:“柔弱胜刚强”,“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等等。中医学中则是讲求阴平阳秘,即阴阳的协调平衡,没有偏扶之处。如《黄帝内经·素问·生气通天论》中说:“凡阴阳之要,阳秘乃固,两者不和,若春无秋,若冬无夏。……阴平阳秘,精神乃治。”明代的李念莪注曰:“不和者偏也。偏于阳,若有春无秋;偏于阴,若有冬无夏。和之者,泻其太过,补其不足,俾无偏胜,圣人之法度也。”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医学中所体现的以平衡、中和为主体的阴阳思维所达到的高度,是《周易》、《老子》所不及的。

第四,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之三是“五行”观。“五行”的本义,最早是中国古人对自然万物的一种富有哲学思辨的抽象概括,后来人们又把它扩展对人(包括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及人事系统和社会历史发展的认同和规范上。典型的有先秦时邹衍的“五德终始”说,汉代董仲舒的五行伦理思想等,而《黄帝内经》则是把它运用到对人的生命体的描述上。

我们知道,有关“五行”观念的文字记载最早见于《尚书》

^① 详见拙著《出入命门——中国医学文化学导论》,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二章和第九章。

一书中，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中医学中的五行观就一定出自《尚书》，同样中医学中的五行说也不同于先秦时的“五德终始”说。这里我们可以将《尚书·洪范》中的五行、邹衍“五德终始”中的五行和《黄帝内经》中的五行作一简略的比较。^①

首先，三者的五行排列秩序不同。《尚书·洪范》五行以“水”为首，下依次为“火”、“木”、“金”、“土”；“五德终始”的五行以“土”为首，下依次为“木”、“金”、“火”、“水”；而《黄帝内经》则以“木”为首，以下为“火”、“土”、“金”、“水”。

其次，三者有关五行之间的相互关系不同。《尚书·洪范》对五行讲顺或乱；“五德终始”对五行关系讲相胜，就是此一行替代（吃掉）另一行；《黄帝内经》对五行关系则是讲相生，就是此一行对另一行具有促进、助长和滋生作用。

再次，更为不同的是《黄帝内经》中的五行关系要比以上两说的五行关系还要多一种形态，就是所谓的五行“相克”关系，是指这一行对另一行具有抑制和制约作用。

最后，中医理论中关于五行的关系除了相生、相克外，还有“相乘”和“相侮”关系，它们分别是指五行之间的生克制化关系遭到破坏后出现的不正常的相克现象。

从上述的比较中，我们不难得到以下两种启示：

首先，三者有关五行的学说各不相同。中医学的五行说是否一定来源于《尚书》或其他所谓的“五方说”、“五材说”还难以考证，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即中医学的五行说也如同阴阳说一样，都是在远古的中国人流传下来的思想中提炼而成的，

^① 有关三者的具体比较请参阅拙著《出入命门——中国医学文化学导论》，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十四章第三节。

而作为一种规范性的文化现象，又总是在各种思想的相互影响和杂糅中诞生的。

其次，中医学中的五行学思想有着相对独立的文化价值和合乎生命律令的科学显示，否则就不可能在治疗学上起到指导作用。

中医学的五行思想不仅在医学中受用，而且还渗透到社会政治思想等领域。如王莽时期的刘歆所创的“五德终始”说，不仅一改邹衍“五德终始”说中的五行排位，而且还将五德（行）间的关系变相胜为相生。改动后的五行形态完全与中医学中的五行形态相吻合。虽然对刘歆为什么要改“五德终始”说学术界尚有争议，但从刘歆的“五德终始”说与中医学的五行学理论相吻合这一事实来分析，说刘歆受中医学理论影响，改创相生的“五德终始”的推论，当是可信的。另外据考证，最早提到《黄帝内经》书名的，就是西汉刘歆的《七略》，可惜该书早已失传。

尽管王莽命短，而刘歆所创的“五德终始”说却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汉光武帝刘秀就是利用汉为火德说，以《赤伏符》“受命”为天子。东汉末，魏文帝以土德受禅。此后，中国历次同一民族间的改朝换代，无不沿袭这一传统，行禅让典礼。从中我们不是可以体悟到中国传统文化中深藏的中医学这一生命文化之意蕴么？

第五，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之四是“阴阳五行合参”观。阴阳与五行，作为中国古代哲学思辨之结晶的文化形态，不仅有着各自不同的文化来源，而且一开始并不是融通合参地加以运用的，这可以从《五经》的考索中得到认同。

如《周易》作为一部专以“道阴阳”的书，不要说其中毫无